

未来的语言会如何发展？本版的两篇文章，分别从文学语言的源头与AI时代的语言规范两个维度，共同探讨语言的本体价值与未来向度，叩问语言的本质与生命。雷平阳对文学语言的“及物”“及义”进行谱系性考察，为文学语言的诗性生成提供了一种基于地域文化语境的阐释路径。寻天琦重中语言规范的核心并非僵化标准，而是创作者的独立思考与表达温度，强调唯有以人的主体性驾驭语言，才能守住文字的生命力。——编者

从“猎虎”到“虎伴”——

文学语言的及物、及义与其源头

□雷平阳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就迷上了云南南部的那片雨林区域，包括此地众多民族的神话、史诗和雨林中无处不在的神秘主义幻象，以及我个人置身于雨林所获赠的孤单、狂喜和哀伤。这一区域主要隶属于普洱、西双版纳、临沧和德宏等州市，是傣族、哈尼族、基诺族、佤族、德昂族等民族的聚集区。20余年间，我数次前往这一区域做田野调查，写作并出版了《普洱茶记》《临沧记》等非虚构作品集；诗集《云南记》《基诺山》《击壤歌》《豹寓言》中的大多数作品，也都取材或创作于田野调查的途中。为此，我还编辑出版了《雨林叙事》和《西双版纳在天边》两本诗歌选集，借以向这方神圣之所致敬。把这一区域说成我的“文字故乡”或“精神策源地”一点也不为过。在《云南记》再版“自序”中，我曾说过：“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想多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当然，这样的文字，目的只是为了定义我与雨林之间的关系，而在诗集《豹寓言》和《临沧记》两书的自序中，我除了继续确认这种关系之外，还开始触及语言问题。前者说道：“我之所以写，基于对所写之物的好奇、看见、发现、思考，也基于我热衷于将自己的思想、知识、审美能力，注入所见的事物之中，使之成为‘此物’之外的‘彼物’，并且努力让语言及物、及义。”后者又说：“在游历披古阅今的众茶山和起源性的司岗里、牡蛎密洞、勐相歌坎这样一些以天堂命名的人间秘土期间，我还创作了诗集《豹寓言》——以此为‘礼失而求诸野’这句出自《汉书·艺文志》的古老谚语招魂，并再次探索语言的源头性在我诗歌创作中的可能性。”

及，原因不外乎我常在昆明与雨林间往返，穿行在个人视野内的“汉语写作现场”与“原生的语言旷野”，见识到一些文字的空洞、苍白和异化。对当下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领域出现的语言失信与失真问题，我也颇为惊诧，更对诗歌的同质化和盲从西化的现象产生了抵触情绪，继而忍不住在四下无人的地方，吼上两嗓子。大抵是2003年的春天，我有过一次近两个月目的地不明的雨林漫游，但事实上我的脚步又局限于景洪市的基诺山和勐海县的勐宋山——它们是确切的地理区域，可又因其梦境般的气质，让我将它们等同于找不到边界的概念中的雨林。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世界的尽头，这尽头又是另一个世界的起点，有浩浩荡荡的风物由此向着未知的辽阔空间铺展出去。进入基诺山的第一天，我经过路边的三个村庄，傣语名字分别叫作“巴飘”“巴坡”和“扎吕”，汉语意思分别是“初恋”“热恋”和“结婚”。在当天的日记中，我是这么记录的：“巴飘、巴坡、扎吕，有文化人类学者认为，它们之所以成为三个村寨的名字，应该是起源于基诺族人的始祖玛黑和玛姐的爱情历程，意在于神圣的定位和纪念，可我隐隐觉得，它们应该是神话之下的拓荒者对身之所天真的命名，是对热气腾腾的生活进行唯美的定格，而非对神话的刻板屈从。并且，这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初恋、热恋和结婚这样的词语来命名村庄，在语言学上是一场无法复制的壮举——这唯一性的语言，无论聆听多少遍，我的心脏均是一面巨木雕刻的永鸣的太阳鼓。”也是那一天，黄昏时分，我去到了杰卓老寨——传说中、鬼、神分家之后，基诺族人祖先最早定居的地方——并在那儿写下了一首名为《基诺山上的祷辞》的短诗：“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请您明天让我捕获一只大的麂子//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祈求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它的产生是如此简单而直接：一个从杰卓山中归来的基诺人邀

请我去他家做客，把手中拿着的“猎物”（不是麂子）放到地上，他就跪到地上，开始面向杰卓山，向山神祈祷。我依稀听到了语言学中最为干净也最为坦率的、并无向上奢求的“小”与“大”、“一”与“两”所串联起来的一段语义回归本真的完美祷辞。那个瞬间，我更像一个古代的采诗官而不是一个诗人，语言也没有成为“诗”，而是成为一道照亮我的闪电。《基诺山上的祷辞》发表后，有的读者从中看到了人“深渊般的欲望”，但多数读者包括我本人之为喜悦的还是语言的及物与及义，朴素、自然、天真，而且所谓的欲望又是如此的节制，只是由“一”而“两”，由“小”到“大”，在商品时代的贪欲之海中仿佛一盏只能照亮人脸的灯。当然也有人认为，麂子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能猎杀的，诗中“事件”即现实事件，理应追责。对此我将诗歌创作等同于现实本身的说法，我不以为然，因为我看见的猎物原本就不是麂子，而是用麂子串起来的几条野鲮。我将其置换为“麂子”的行为，约等于《酉阳杂俎》中那位老和尚“射虎”，虚构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成就一种值得信赖的“诗歌现实”。这次基诺山之行，是我写作诗集《基诺山》的缘故。2014年秋天，《基诺山》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序言中我写道：“诗歌写作的难度，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将‘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一些人容易将它们混为一谈，一些人则喜欢用后者彻底覆盖前者，我奔波在两者之间，就像基诺人或者乌蒙山人奔波于人间与天国之间的那条盘山路。古代基诺族人被逼到尽头上的超现实情爱观认为，人与鬼是可以谈恋爱的，人与神是可以结婚的。我觉得，在现实中，我是那个与鬼谈恋爱的人，在‘诗歌的现实’里，我则是那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人。”我由基诺族人世居的基诺山漫游到有着很多拉祜族山寨的勐宋山。当时我对拉祜族并无多少了解，只是粗浅翻阅过拉祜族的创世史诗《牡

帕密帕》和迁徙史诗《根古》。史诗中说，拉祜族的创世始祖厄莎在造人的时候，专门给拉祜族人锻造了一支金箭、一支银箭和一支铜箭，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必须离开天堂般的故乡牡蛎密洞，你们就朝着南方射出这三支箭，箭落之地，就是你们新的故乡。没人能预测到勐宋山是那三支箭的降落之所。在以竹筒茶闻名于世的那卡村，拉祜茶人娜卜是一个极为幽默的人，她瞪着一双大眼睛，如此回应我的提问：“也许三支箭没有一支飞到勐宋山，我们跑得比箭还快。”然后指了指山上的古茶园说：“因为我们的鼻子灵，早就闻到了茶香，抢先把这当成了新的牡蛎密洞。”她的幽默是有原因的：传说厄莎女神造文字的时候，把傣族和拉祜族的祖先都召至天国，让他们认真记录。傣族祖先把自己的文字记在了贝叶上而得以流传世间，拉祜族祖先则把文字记在了充饥的饼子上，把文字吃进了腹中，记在了心上，所以拉祜族人的话语一直独立于“文字”之外，每一句话都是亮堂堂的“心语”，出自肺腑。后来，娜卜成了我20多年一直保持联系的好友，我知晓的关于勐宋山乃至整个勐海县的雨林消息大多数都源于她。也就是那一次，她认真地告诉我，按照20世纪50年代初期族群认定时的阐释，“拉祜”的意思是“猎虎”，拉祜族是一个猎虎的民族，并随口唱出了《根古·牡蛎密洞》中的几句：“牡蛎坝头银坝口，黑竹弩箭打老虎。密坝坝头金坝口，黄竹弩箭打麂子。打得老虎烤肉吃，虎肉好吃满口香……”一边唱，一边还比画着以箭射虎的动作。之后，我翻阅过不少的地方文史资料，解释“拉祜”一词时，口径都与民间传说一致：猎虎。在勐宋山、南糯山、布朗山和双江县的“傣黑大山”，人们介绍拉祜族，无一不是“猎虎的民族”，有的拉祜族青年在自我介绍时甚至会说：“我是一个杀老虎的人。”而我也并不止一次在写作中使用过这样的定义，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就

在同一片雨林中，时间转移至2024年春天，也就是我第一次进入基诺山的21年后。当我来到勐宋山西南面冰岛峡谷中的南迫老寨——史诗中拉祜族人迁徙史上的一个重要中转地——与人们交流时，这种定义遭到了拉祜族人罗扎克的确明确反对。他双目有神，逼视着我：“拉祜人怎么会杀老虎呢？”他说这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老虎的伴”。老虎的伴，虎伴。听到这个词的一瞬，我开心地叫了起来。有意思的是，在之后另一次关于拉祜族人迁徙史的田野调查中，我在与拉祜族老者闲聊时，听到了一则与《根古》打虎之说内容相反的民间故事，大概内容是：拉祜族人的一个古代若木（大酋长），曾经建立了一个天堂般的部落，但他们不善于战争，就领着仙女般的妻子、足智多谋的占卜师和几个勇士，前往澜沧江的对岸去找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向他学习打仗的魔法。可在学成之后返回部落的路上，因为“无所不能的人”忘了教会他们把万物变为美食的方法，他们无法忍受饥饿，只能施展出“无所不能的人”教给他们人变野兽的魔法，希望能追捕到猎物果腹，结果当咒语一念，大酋长变成了老虎的头，他的妻子变成了老虎的腰身，四个勇士变成了老虎脚，占卜师变成了虎尾，他们共同变成了一头之前世界上没有的“老虎”，并将不曾变化的随从遣返部落。“变虎”的目的是觅食，但成为森林之王后，老虎没有回归部落。拉祜人没有怨恨这几位变虎未归的人，反而时时赞美，并因为老虎具有拉祜人的血统而把老虎视为拉祜族的一个分支。我无法查证这个民间传说诞生的年代，但它与罗扎克所说的“虎伴”一词如此贴合，让“猎虎”一词在演变中获得了更为纯正的血统及其合法性。同时，也向我个人昭示了语言在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属性，让我在书写时把文字的准确性、有温度、有人性和神性这些品质视为方向。（作者系诗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AI时代的语言规范

答案在每一个执笔者的手中

□寻天琦

2025年，语言学家朱德熙一段写于40多年前的文字，被选入了高考语文全国二卷的语言文字应用部分的试题。这段文字出自他对报纸文章《微小的敌人：灰尘》的评改，文中有一句“对灰尘之类的小东西，常常是不以为然的”，朱德熙认为，这是把“不以为然”误认为是“不在乎”了。“不以为然的”然”是“对”的意思，这个词应该表示“不认为是对的”，跟“不在乎”是两码事。接着他写了这样一段话，成为高考考题的核心：“有人说，语言是不断演变的。今天认为是不合法的用法，等到用的人多了，慢慢就变成合法的了的。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反对它。这种理论是似是而非的。因为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势必对于语言里所有新出现的不合习惯的说法都一概承认是合法的，那么我们的语言还有什么规范和标准可言呢？只有当一种说法得到社会普遍承认之后，我们才能承认它的合法性。这就是语言学家的态度。从这一点看来，语言学家是非常‘势利眼’的。”

“语感”，来自对海量文本数据的统计学习。人们对语言的误用，会被老师纠正，被语言规范；但在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它可能只是一个概率分布的微小偏移——没有预警，也没有人因此负责。这意味着，我们对语言规范的态度需要经历一次辩证的调整。当语言规范体系已相对完善，而AI作为一个缺乏约束的语言生产者出现时，我们面临的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如何建立语言规范”，而是“如何在一个人机共生的语言生态中维护规范的效力”。语言当然需要变化，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变化本身就是活力的证明。但是，这种变化不应被算法的统计分布所裹挟。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语言规范的意义。而这，正是朱德熙的评语在AI时代获得新意义的原因。他反对的不是语言变化本身，而是那种“因为有人用所以就应该承认”的放任态度。他要求在“有人用”和“承认其合法性”之间有一个“社会普遍承认”的环节，有一个观察、判断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过去是由人来完成的：老师指导、编辑把关、读者听者反馈。或者说，这是一个需要语言使用者集体“跟风”的过程。但AI不会脸红，不会犹豫，不会在写完一个句子之后觉得不安而删掉重写。它只是按照概率输出，无形中影响、塑造着人们的语言习惯。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AI生成的文本到底有什么问题。一位初中生说，用AI帮自己写作文，虽然AI用了很多高级的、自己不会用的词汇和表述，但是读起来，好像让人感受不到文章的气息、温度和韵律，在文章中找不到“我”。一个“找不到‘我’”道出了问题的核心。当流通的文本大多是这种被AI生产出来的，语言还能保持它的精确性和表现力吗？问题还不止于此。相关研究发现，GPT-4o等模型的中文词表污染高达46.6%。这些模型在处理中文污染词时“不能理解甚至不能重复”，

类关于语言规范的讨论，目前也应该还没有“犯错”的意识。这就是AI时代语言规范面临的新挑战。当大量文本由模型的自行生成，这些文本又反过来成为新的训练数据时，语言的演变可能就不再是一个人类社会内部有意识、有选择的进程，而可能成为一种被AI介入的、缺乏束缚的“漂移”。我们会漂向哪里？不知道。但可以说，方向不再完全由我们决定。面对现状，人们大概会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放任。“语言本来就是不断演变的，何必大惊小怪？”这种论调听起来很豁达，实则不负责任。语言固然是活的，但“活”不等于“乱”。语言的活力来自使用者的创造，而不是来自对错误的宽容。当误用和讹传被AI放大、固化，语言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精确性，而精确性，恰恰是语言作为人类交际与思维工具的关键特性。第二种是拒斥。有人主张甚至要求在各个领域禁用AI写作。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不太现实。AI生成文本的成本低、效率高，确实在很多场景下提供了便利，完全禁止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同时，我们也要充分相信，语言本身具备适应和调节的机制，语言生态在广大语言使用者的共同维护下不会被AI冲击得“面目全非”。第三种态度是什么？语言学家的“势利眼”或许能给我们启发。他不是一味反对语言的变化，而是强调要有一个“观察期”，要等一种用法“被社会普遍承认”之后才能接纳它。这意味着我们今天要有意识地重建一种机制——在AI文本和人类语言之间，摆一道“审查”关。这个“审查”是一种集体的语言自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层面：教育层面。语文教育应当重视语言的基本功，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让他们能分辨什么表达准确、鲜明、生动，什么表达似是而非。一个接受了良好语言训练的人，才会在使用AI辅助写作时，有足够的判断力去主导写作，而不是被

AI带跑。媒体层面。报纸杂志、出版社、内容平台应该参与到语言“把关人”的行列中。朱德熙曾在《大家都有责任》一文中说，改进文风，语文工作者、作家、翻译工作者、编辑工作者责任尤其大。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有效，并且涉及的范围更大了。当AI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专业的编审就变得更加重要。一篇经过认真编辑的文章，不仅是在传递内容中的真知灼见，也是在为语言规范树立标杆。技术层面。大语言模型本身也可以进一步改进、规范。未来的模型是否可能引入更多的约束机制？比如，在训练数据中提高优质的、规范的文本的权重，降低低质文本的影响。尽管相关的技术路径仍在探索中，但我想，方向是明确的：让AI学会“说好汉语”，而不只是“说汉语”。汉语是一种有着深厚传统与历史的语言，几千年来，它经历过无数变化。然而近代以来，汉语的每一次巨变都伴随着某种焦虑。五四时期，有人担心白话文会毁掉汉语的美感；20世纪90年代，有人担心网络语言会让汉语变得粗鄙。这些焦虑中有的被证明是多余的，有的则确实出了问题。AI时代带来的变化，或许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因为以往的变化，无论多么剧烈，始终是在变、人在用、人在选。而这一次，AI参与进来，并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AI可以做到“倚‘码’千言”，但它还不够“认真”，认真是我们的事。回到2025年的高考语文试题。朱德熙在文章中还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写文章时用语不符合一般人的习惯，别人对作者和他的文章也会有看法。文章是写了给人看的，我们不能不考虑它的社会效果。”目前的AI可以海量生成文章，但还理解不了这背后的东西，那就是人对自己所写的话的责任。每位在考场上答题的年轻人，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一场关于语言规范的讨论：语言的变化有没有边界？谁有权决定这些边界？答案不在试卷上，在每一个执笔者的手中。（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